

<<一将难求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一将难求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6878989

10位ISBN编号：780687898X

出版时间：2011-9

出版时间：白山出版社

作者：张正隆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一将难求>>

内容概要

“打铁的”梁兴初  
儒将李天佑  
旗官丁盛  
“好战分子”钟伟  
虎将胡奇才  
“旋风部队”司令韩先楚  
战将刘震  
文武邓华  
威猛贺晋年  
黄永胜获赠“免死牌”  
“林罗刘”——刘亚楼  
参谋长解方  
“苏静能当十万兵”  
吴克华机断专行  
李作鹏当机立断  
徐国夫抢得先机  
“攻坚老虎”龙书金

<<一将难求>>

作者简介

张正隆，1947年出生，辽宁本溪县草河口镇人。

著名军旅作家。

中共党员。

1966年高中毕业，1968年赴本溪县小市公社插队务农，1969年应征入伍参加解放军，历任81065部队战士、排长、新闻干事、宣传干事、沈阳军区文化部创作室专业作家。

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，代表作有长篇报告文学《雪白血红》、《枪杆子1949》、《解放》、《西部神话》、《战将》、《战争记忆》，中篇报告文学《大寨在人间》等。

长篇报告文学《血情》获第三届解放军文艺奖及中国报告文学505杯奖，另有10余部长、中、短篇报告文学获军内外省军级以上报刊优秀作品奖。

## &lt;&lt;一将难求&gt;&gt;

## 书籍目录

## 《一将难求—四野名将录（上册）》

## 第一章 “打铁的”梁兴初

1. 一身伤疤打上来
2. 把刘志丹根据地“抓”回来了
3. “兔子吃鸡”
4. 节骨眼上的胜仗
5. “宁当鸡头，不做牛尾”
6. 黑山阻击战
7. “万岁军”

附：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战斗序列列表

## 第二章 儒将李天佑

1. 一手大刀，一手驳壳枪
2. 一个团打掉一个团
3. 平型关战斗主攻团长
4. 拿下哈尔滨
5. 攻坚战
6. 眼力

附：四平攻坚战战斗序列列表

## 第三章 旗官丁盛

1. “丁大胆”
2. “游击师”出手不凡
3. 打烂的军旗
4. 点了白崇禧的死穴
5. 常挂在嘴上的是“作风”

附：衡宝战役战斗序列列表

## 第四章 “好战分子”钟伟

1. 成名战
2. 打违抗命令的胜仗
3. 头等主力师
4. 雷霆万钧克沈阳
5. 青树坪失利
6. 性格决定命运

附：靠山屯战斗战斗序列列表

## 第五章 虎将胡奇才

1. 大别山中放牛娃
2. 恶战连连
3. 撤职与擢升
4. 土门突围
5. 围点打援
6. 歼灭“千里驹”
7. 虎啸塔山

附：塔山狙击战战斗序列列表

## 第六章 “旋风部队”司令韩先楚

1. 第一次战斗
2. 别样的勇敢

## <<一将难求>>

- 3.出关第一仗
- 4.“他不知道我的厉害”
- 5.一个师打掉一个师
- 6.战争之神
- 7.战争中最有效的打击是出奇不意
- 8.运气
- 9.跨海之战
- 10.追赶战争
- 11.“从未做过政治工作”

附：海南岛战役战斗序列表

《一将难求—四野名将录（下册）》

### 第七章 战将刘震

- 1.“勇敢分子”
- 2.用脑子打仗
- 3.“连战连捷”
- 4.能啃硬骨头
- 5.志愿军空军司令员

6.战争大学

附：锦州攻坚战战斗序列表

### 第八章 文武邓华

- 1.书香门第
- 2.“文人和武士”
- 3.说“不”
- 4.指挥海南岛战役
- 5.预见到美军可能在半岛中腰部登陆
- 6.再说“不”
- 7.用胜利打开他们的嘴巴
- 8.天赐的宝贝

### 第九章 威猛贺晋年

- 1.投笔从戎
- 2.猛将
- 3.剿匪专家
- 4.攻取隆化
- 5.赣西南再显身手
- 6.将军竹

### 第十章 黄永胜获赠“免死牌”

- 1.跟着毛泽东上井冈
- 2.党代表罗荣恒
- 3.红星奖章
- 4.一直是军事干部
- 5.三战三捷
- 6.“这个黄永胜，真有一手”
- 7.浮沉

附：秋季攻势三战三捷战斗序列表

### 第十一章 “林罗刘”——刘亚楼

- 1.又是政工干部
- 2.在伏龙芝军事学院

## <<一将难求>>

3.名将之恋

4.司令部正规化

5.极具个性魅力

6.天津战役前线总指挥

7.空军司令员

附：天津攻坚战战斗序列表

### 第十二章 参谋长解方

1.大医医国

2.没想到学生打老师打的这么狠

3.忧国救国

4.韩解组合

5.志愿军参谋长

6. “ 主要对手是解方 ”

7. “ 外圆内方 ”

### 第十三章 “ 苏静能当十万兵 ”

1.学生兵

2. “ 坐机关 ”

3. “ 抓人容易放人难啊！

”

4. “ 密息 ”

5.高参

6. “ 联络员 ”

7. “ 我与林彪关系最密切 ”

### 第十四章 群像：吴克华及其他

1.吴克华机断专行

2.李作鹏当机立断

3.徐国夫抢得先机

4. “ 攻坚老虎 ” 龙书金

参考书目

关于采访（代后记）

特别鸣谢

## &lt;&lt;一将难求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插图：军职简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任红4军班长、排长、连长、营长，红一军团2师2团团长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营长、副团长，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，山东军区教导5旅旅长，新四军独立旅旅长，山东军区1师师长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任东北民主联军1师师长，6纵副司令员兼16师师长，10纵司令员，38军军长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任中国人民志愿军38军军长，20兵团代司令员，西海岸指挥所代司令员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司令员，广州军区副司令员，成都军区司令员。

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。

1. 一身伤疤打上来 梁兴初，高个，长脸，浓眉下一双眼睛不大，却动不动就瞪得老大。

最惹眼的是那张大嘴，上颚门齿前突，张不张口，都显一口大牙，早在红军长征时就得名“梁大牙”。

从山东到东北，好多人不知道梁兴初这个大号，倒晓得打铁的、铁打的“梁大牙”——包括战场上的那些对手。

1912年出生，1930年参军，家乡江西省吉安县陂头街，千余户人家都姓梁。

梁家祠堂叫永慕堂，红4军总部曾设在永慕堂，毛泽东和贺子珍就在堂内成的亲。

小镇青山绿水好风光，那也只能是富人的目光。

梁兴初的父亲是个篾匠，苦劳苦作，供他读了3年书，一病不起。

这个家要塌天了，12岁的少年就成了顶梁柱，去到一家铁匠铺。

五六斤重的大锤，一抡就是几个小时，直到3年后红军来了。

通红的炉火，铁锤砸在铁砧上的响亮，火星四溅中挥汗如雨。

比那把大锤高不了多少的稚嫩身材，比风箱还沉重的喘息，脖子、太阳穴鼓突的青筋，好像随时可能爆裂开来。

火星子溅在脸上，溅在赤裸、黝黑的瘦巴巴的肩背胳膊上。

汗水甩进炉火里，在被锤打得通红的铁活上咻啦咻啦地溅起轻烟。

在后来打仗、不打仗的日子，在行军也能睡着的梦里，那个少年铁匠的影像，应不会不在梁兴初的脑幕上映现。

那稍显的驼背，就是那时留下的印记，也锤炼了强韧的筋骨和打铁的性格。

从通常被称为战士的士兵，到班长、排长、连长、营长、团长，红军时期的梁兴初一步一个台阶，都是军事主官。

1932年冬，在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中，梁兴初荣获“模范连长”称号，并被授予红星奖章。

红星奖章是红军时期一种非常高的荣誉，获得者少之又少，只是今天我们已经说不出他这枚奖章的具体来历了。

之后不久，在于都河附近的一次遭遇战中，红一军团2师5团9连连长梁兴初，率连猛打猛冲，将敌击溃，并顺势抢占制高点。

激战中，一颗子弹从左腮打入，从头上穿出。

毫无疑问，这是致命伤，可他仍在呼喊指挥战斗。

没人说得清这是一种什么力量，这是个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人。

血从头上、腮上流着，随着喊叫声从口中喷溅着，血人似的。

直至打退敌人的第七次、也是最后一次进攻，才不支倒地，昏死过去。

官兵都说：咱们连长是铁打的。

铁打的也不行了，棺材都做好了，就放在后方医院的院子里。

第三天夜里，有人听他喊饿了，要吃饭，大呼小叫说诈尸了。

医生跑来一看，也吓了一跳。

个把月就出院了，他说谢谢医生，救我一命。

医生说：不是我救的，是你这人真是铁打的呀。

<<一将难求>>

枪伤，刀伤，手榴弹、炮弹、炸弹炸的，从头到脚，梁兴初身上伤痕累累，坑坑洼洼。

仅红军时期就负伤7次。

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。

梁兴初和像他一样的开国将军，那时没这话。

他们中的许多人，是为了解决肚子问题投身革命的，用枪杆子去揍那个不平的世界。

本书写到的四野名将，大都是一身伤疤打上来的。

## &lt;&lt;一将难求&gt;&gt;

## 后记

年轻时，诗歌、散文、小说什么都写，这20多年来基本就写报告文学了。

所以，这里谈的是关于报告文学的采访，苦辣酸甜都是实践中的体会。

1. 弄虚作假就没命了 置身于作家行列，难免让写报告文学的人感到不伦不类，却也明白宣示这种文学样式除了虚构外，所有的文学手段都可运用。

《阿Q正传》中的阿Q，鲁迅先生说他是未庄人。

未庄在何省何县？

没人知道，是虚构的。

没有未庄，何来阿Q？

可不同时期的读者，多少都能在自己身边看到阿Q的影子。

生活中并没有这个阿Q，他是阿Q式人物的集合体、典型形象——这就是小说与小说的真实。

报告文学就不行了。

你写个什么人，说他住在什么地方，去到那座城市，找到街道小区门牌号，敲响门铃，开门的、或进屋看到的，就得是他，确有其人，确有其事。

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故事，从情节到细节，以及心理活动，都是具体存在着的、真实的。

1989年秋，我开始采访关于东北抗联的长篇，开篇就是“九一八”之夜。

1931年的这一天，是农历8月初7，为上弦月。

这天晚上是阴是晴，有没有星星和那弯痛苦地佝偻着的月亮？

查阅档案资料，只在时任驻北大营7旅260团3营9连上尉连长姜明文的一篇文章中，见到“夜暗无光”4个字。

2000年春在黑龙江东宁县绥阳镇采访，见到一位93岁的7旅老兵陈广忠，他也说记不准了，只记得“那天晚上挺黑的”。

“九一八”之夜阴晴雨雾，军事上并无多少意义。

但作为文学作品，有时免不了要写写夜色什么的。

1991年夏，在哈尔滨某集团军采访关于苏宁的长篇《血情》，赶上八一电影制片厂携影片《大决战之辽沈战役》，到那儿慰问参加拍摄演出的部队。

听说我在那儿，摄制组的几个同志让我谈谈，我说感觉挺好，真的挺好，又让我谈谈缺点、毛病。

辽沈战役9月12日开始，这时田里庄稼是种收割与待收割状态，影片里的大地光溜溜的，连根庄稼毛也没有。

俗话说“二八月乱穿衣”，如今气候变暖，那时要冷些。

可再冷，再乱穿衣，也不能像影片中那人那样穿棉衣、戴狗皮帽子呀？

那是奔袭北宁线，别说白天“秋老虎”多毒了，就是晚上行军，那裤裆也一会儿就“抓蛤蟆”了。

还有攻打锦州外围据点配水池，墙上标语“配水池是第二凡尔登”的“尔”，应该是繁体字的“”。

1987年夏，我实地采访时，还能隐约见到这个“雨”字。

我第一次被指为“失实”，是1981年发表在《解放军文艺》第5期上的《力量》。

那时发篇东西不容易呀，高兴劲儿还没过去，杂志社来信了，说有读者来信，指出几处事实是“捏造”的。

看信，对照作品，翻看采访笔记，想着采访时的情形，怎么也搞不懂哪儿是假的，那心里也怦怦直跳呀。

赶紧报告领导，领导派人调查，结论是事实并无出入，有人对作品主人公(一位副连长)有意见，写了匿名信。

谈到我的某部作品，有人说：你要是弄虚作假，有几处硬伤，坐地就完蛋了。

其实，我也曾“弄虚作假”。

那时我在某集团军宣传处当干事已经11年了，集团军树的先进典型，我大都写过报告文学，所作所为都是事实，问题出在心理活动上。

## &lt;&lt;一将难求&gt;&gt;

我是“文革”后期开始写作的，那时有句著名的“八字真言”，叫“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”。事情没假，可先进人物心里怎么想的呀？

有时就拔高了、弄假了。

有些话也确是采访对象说的，任何人都难免时代的局限，那时报刊也不能不迎合“潮流”。而我为了发表作品上稿子，有时觉得不够劲，也弄出些不着边际的“高大全”的大话、空话。

夸大事实，编造事实，作者心知肚明，主人公也一样。

看事迹挺动人，心理活动就悬天悬地腾空了。

这属“高于生活”的说好话，主人公一般说不出“不”来，可读者的感觉呢？

感觉好像挺虚空，不是硬伤，可文学就是一种感觉，总让人感觉不舒服，那还能读得下去吗？

今天弄虚作假，还可能成被告，肯定败诉。

比之其他的文学样式，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和魅力所在，弄虚作假就没命了。

2. “怀孕”——采访自己 决定写个什么东西了，立刻把她揣进心里，我称之为“怀孕”。

记得是1985年兴安岭大山火前后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来封电报，要我到西藏采写篇东西，待下一封电报立即动身，直接到成都军区报到，再转赴西藏。

如今电话方便，家里放的，随身带的，天南地北全球通。

那时不行。

那时常拍电报的是上海《文汇报》，约个稿子，稿子准备发表在几月号上，也发个电报。

我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打交道最多，这辈子就接到这么一封电报，感觉是十万火急。

妻子给我收拾行装，我就把有关资料收集起来，往包里装，往脑子里吃，赶紧“怀孕”呀？

结果等来的是军区转来的电话，不去了——刚怀上就“流产”了。

鲁迅先生说他把喝茶、聊天的时间，都用来写作了。

鲁迅是天才。

我熟悉的作家中，有些人在我眼里也是天才。

我不能说我。

多么笨，一点悟性没有，但我确实没他们聪明、精灵。

笨鸟先飞。

我的办法是接受任务，或是决定写个什么东西，立即进入情况，从“怀孕”到“分娩”都全力以赴，一点儿也不敢懈怠。

1984年初，我在北京改完一个中篇，《解放军文艺》编辑部主任陶泰忠，让我去山西写大寨。

我说怎么写，他说实事求是。

如今50岁以上的人，谁不知道大寨呀？

自上世纪60年代成为农业战线的典型，到“文革”结束，报纸、电台哪天不宣传学大寨呀？

彻底否定“文革”，又批大寨。

我觉得这个题材重大、敏感，有点拿不动，又有一种激动、兴奋，令人身不由己，就说试试吧。

他说，大寨当年被捧到天上，后来又被踹到地下，这两年销声匿迹，不知哪去了。

所以，这个东西的题目中，最好能有“大寨”两个字。

我脱口而出：就叫《大寨在人间》。

他略一思忖：好，就这个题目。

刚“怀孕”，孩子的名字就起好了。

2000年春，黑龙江省东宁县武装部、宣传部，要我去写当年日本关东军修筑的“东方马其诺防线”

。我和妻子乘车前往，脑子里那个车轱辘转哪转哪，写个什么东西呢？

突然，想起日本国歌叫《君之代》，日本国旗叫“日之丸”——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完蛋一次了，如果他不认真反省历史，悔过自新，重走老路，还得完蛋。

我一拍大腿：有了！

妻子说：什么“有了”？

我说：书名有了，就叫《日之完》。

## &lt;&lt;一将难求&gt;&gt;

书名、题目，目者，眼睛也。

文章的题目、书名，常常是画龙点睛、概括内容、表现主题的。

没个好书名，有时拿起笔来就像射击找不到靶子、目标，不能三点成一线，会把子弹打丢了、打散了。

好名字来之不易，有个好书名，文章就活了，老高兴了。

是不是主题先行了？

采访前从未去过大寨，可“文革”前就读过孙谦的《大寨英雄谱》。

后来对大寨的上天入地，平时也不能说一点了解、认识都没有，只是没想过要写东西而刻意地“怀孕”而已。

《日之完》也是一样，之前采访抗联，已经占有许多与之有关的素材、资料了。

就是说，还未动身，就可以调动、发掘过去的积累、库存，已经开始搜肠刮肚地采访自己了。

任何人写任何东西，或多或少，都有个采访自己的过程。

作家常说“写自己熟悉的东西”，原因之一是有丰富的库存，可以大量地采访自己。

3. 一听二问三闲唠 写一个人，要采访许多与之相关的人，写许多人就更不用说了。

但是，谁也不能代替将要成为笔下人物的采访对象的讲述。

对于一个一无所知的人，开头那是只能听他讲的。

即便不是如此，我觉得仍宜先听他讲，而且尽量听他讲完、尽兴。

像我多年来主要采写历史题材的军事文学，只要是战争年代的事情、感觉，无论怎样海阔天空，都不离题。

就算离点题，老人谈性正浓，也不宜打断。

谈到激动处，往往语速很快，记不下来，也不宜截住话头，说你再重复一遍。

他感情爆发出来，滔滔不绝，是最易出神来之笔的时候。

断了兴致，坏了情绪，就得缓一阵子，效果可能差多了。

断了话头，很多精彩处可能就出不来了。

采访到一个了解情况，记忆力好，又会讲故事的人，老高兴了。

有人当领导惯了，讲起来跟作报告似的。

但是，战争毕竟是最实际的，通常迟早都会进入境界的。

听得差不多了，就问。

时代的进步与发展，时空与职业的差异，使得这个世界我们不懂的事情太多太多，越来越多。

笔下人物五花八门，就不能不对他们从事的职业、专业有所了解，起码别弄出笑话来。

而那种年代久远的历史题材，对于你还未来到这个世界时的那个世界，则几乎一切都是陌生的。

像东北抗联，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和自然环境的恶劣，其斗争的悲壮、惨烈，斗争方式的独特性，别说在中国，就是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舞台上，也是绝无仅有的，是常人、今人难以想象的。

而且那时社会大众的衣食住行，别说和今天不一样了，有很多东西已经消失了，像轨靴、大车店、铁匠炉什么的，还有关东山“三大怪”之类，以及一些方言土语。

要把读者带进历史，首先你得“身临其境”。

同样的抗战题材，如果让我这个东北人写新四军江南抗战，要问的就更多了。

在《雪白血红》中，我写刘亚楼在苏联“啃了5年黑面包”，并未说明黑面包是多么粗劣的食品，一个“啃”字已经道白了。

新华社一位驻前苏联资深记者写信，告诉我错了，黑面包其实是种挺高档的食品。

不懂的要问，有疑问的当然也要问。

同一个人谈同一件事，这次与上次谈的有时就有出入，通常为细节。

几个人谈同一件事，有时出入可能更大，而且不仅是细节。

就尽量再找些当事人，或者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准，或者以主要当事人的记忆为准，或者感觉哪个人讲话更实诚些，记忆力也好，可信度就高。

实在搞不清楚拿不准，宁可舍弃。

上世纪80年代有部挺好的电影《归心似箭》，有抗联老人看出毛病、破绽了：那抗联战士在山里睡

## &lt;&lt;一将难求&gt;&gt;

觉，怎么还盖被子呀？

天大房子地大炕，火是生命：森林是故乡。

那时就靠火，没火，盖多少被子也冻死了。

冬天树皮，夏天野菜，还得打仗，就算有被子，东跑西颠怎么背呀？

“文革”前和“文革”期间，我读过许多散文、特写、报告文学，以及如何写作的理论文章，印象深刻的一句话，是“无一事无出处”。

其实，有出处并不一定是对的。

你对你所描写的那段时空不熟悉，缺乏判断力，可能以讹传讹。

而这里，睡觉嘛，当然要盖被子了。

编导这么想着，观众也看不出破绽，可亲历者能看出来。

即便亲历者百年之后，还有专家，还有明白人。

事无巨细，我不敢说我写的都准确无误，而只是经常提醒自己认真、深入，鞭策自己写什么就要成为研究什么的专家。

这是很难做到的，但是必须为之努力。

对于可能引起争议的敏感问题，尤其要问个明白，抠得仔细。

比如关于一次战斗、战役打不打，怎么打，同级之间，上下级之间，仁仁智智，公公婆婆，实在是正常而又自然的事情，你只是如实地记述了过程。

但是，这个对了，那个错了，有人可能会觉得没面子，而过去通常都说是“党委决定”（这样大家都是名将，等于没有名将，也就没有这本书了）。

采访时一定要较真，尽量多找些知情人，找到当时的文电资料，务必有理有据，四脚落地。

相信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会和我一样，有时会有种进了“地雷阵”的感觉，有应对作品发表后各种反响的准备，包括打官司。

有的问题敏感而无所谓，就权当它没发生，不存在，从这颗“地雷”旁绕过去就是了。

有的就绕不过去，因为舍此历史就断了链子，天地良心也饶不过你。

任何职业和行为，都须有一种操守和道德义务。

这就要求采访时务必慎之又慎，尽力把来龙去脉，把事实搞清搞细搞准，落地生根。

这就等于把“地雷”拆解了，它就变成“臭雷”了。

即便踏响了，也伤不了人，起码使伤害降到较低水平。

“啃黑面包”，属不能引大多数读者发笑的笑话，至于观众看到影视上半个世纪前的街道、山野间，飘挂块被称作白色垃圾的塑料布，那就集体吃了苍蝇。

而把一些比较大的史实、情节搞错了，那麻烦就大了。

觉得没什么可问的了，最好的办法是问人。

一起参军的几个人呀，都叫什么名字，谁健在（可以去采访），谁牺牲了，怎么牺牲的？

刚参军时全班几个人，当班长时全班几个人，各自的性格特点，副班长是谁，还有排长、连长、指导员、副连长、副指导员，还有当排长、连长时的上下左右的人。

不可能都讲得那么清楚，各个时期也总会有几个印象深刻的人，有人就有事，有故事。

觉得实在没什么可问的了，如果条件允许，就跟他闲唠。

任何采访对象，无论是滔滔不绝的，还是茶壶煮饺子的那种，只要有相当阅历，又有条件，我都会采取这种方式。

特别是讲述历史的老军人，几年、十几年的战争生涯，记忆力再好，也不可能没有遗漏。

况且一些人几十年来在各种场合，对不同对象讲过多少次了，已经形成一种套路，其中一些东西又是报告文学难以表现，或不需要的。

提问可以启发回忆和想象，有时又无从问起。

这种唠家常式的采访，意在拾遗补漏，常有意外收获。

而且再善于说官话的人，在这样的闲唠中，也会表露出比较真实的内心世界。

这种闲唠式采访，有时半天一无所获，有时让你热血沸腾，惊喜连连。

一听二问三闲唠——我的采访三部曲。

## &lt;&lt;一将难求&gt;&gt;

## 4. 什么叫“采访完了”？

某集团军大连干休所有个抗联老人曹曙焰，1935年参加4军，4军西征失利后到7军。我是1998年3月知道的，即去采访，有空就去，一次半天。

两年间采访多少次，我没查采访笔记，少说不下30次。

每天上午8点前到，进屋坐客厅就唠，12点左右走人。

曹曙焰老人不是很会讲故事的人，但记忆力挺好，而且像绝大多数的战争幸存者一样，对战争年代的经历印象深刻。

那是把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生命献给了人类最美好的事业，日里夜里梦牵魂绕的呀。

他是丹东凤城县人，在那儿过不下去了，10岁随父亲逃荒到黑龙江穆稜县，又辗转到密山县，在密山参加抗联。

那时的“过不下去了”是个什么概念、状态？

我请他谈谈他家的情况，几口人，几间房，几亩地，院子什么样儿，屋里什么样，地上、炕上、墙上摆挂些什么物件。

从辽宁到黑龙江，你见过的最富的人家什么样儿，最穷的人家什么样儿。

“家徒四壁”，过年了是不是也买几张年画，那时那年画上画的都是什么，等等。

问日本人怎么欺负中国人，问抗联的密营，怎么打鬼子，负伤了怎么办，老人讲得耐心、细致。

密营里大都有缝纫机，问是什么牌子，样子与今天有何不同，他就不大理解，说抗联是打鬼子的，这些写书里有什么用呀？

如今80岁以上的老人，称日本、日本人为“日本子”，称日本侵略军为“日本鬼”，管搞矿山的叫“矿山鬼”，做生意的叫“买卖鬼”，开拓团叫“开拓鬼”或“庄稼鬼”。

开拓团是从日本来的移民，搞农场，种地。

那是民间没有“农民”一说，种地的都叫“庄稼人”，种地的日本人就成了“庄稼鬼”。

像曹曙焰这样土生土长的抗联老人，采访中常冒出些方言土语，像我这等年纪的人还能听懂。

新中国成立后推广普通话，如今港澳地区也提倡普通话，可我写抗联的长篇，那人物对话也是现代的普通话，岂不假了吗？

采访回来看笔记，什么问题没唠明白，又引出什么新问题。

每次采访完预定明天时间，要是隔上一段时间，提前打电话约定一下。

有个细节不清楚，在电话中唠上半小时。

后来老人耳朵有点背了，电话中听不清，就跑一趟。

曹老不止一次地说：哪有像你这么采访的，都把我榨干了。

这种“榨干战法”，某种意义上就是闲唠式采访。

所谓听问唠三部曲，不可能泾渭分明，特别是进入闲唠阶段。

海阔天空，也不是漫无目的，而是心中有数，限定在一定的时空之内。

但也不能一概而论，比如“文革”中的抗联老人，除了被冠上“走资派”及惯常的一些罪名外，比较普遍的还有“胡子”（东北人管土匪叫“胡子”）、“苏修特务”、“×修特务”。

提起“文革”，联想这些，就可能再推开一扇、几扇遥远的记忆之门。

如果有读者与我一道采访曹曙焰老人，在曹老貌似平淡的讲述中，相信那体会、感觉只能用“闻所未闻”来形容。

而令我兴奋的，则是又发现了抗联的一座富矿，而且这座富矿就在身边。

2005年退休前，我所在的沈阳军区创作室每人每年经费1.500元，乘飞机去趟广州，就得一路打工挣钱回来了。

报告文学这个东西，大量的工作是采访，没钱就走不动。

采写《雪白血红》，是上级给的任务，有文件，拨专款。

抗联原本也是一样的，后来因某种原因，成了个人行为。

当年抗联活动的地区有40来个市县，采访散落民间的抗联老人，烈士遗属、后人，当地了解抗联的人，县委党史办人员，每个县应个把月左右，吃住行得多少钱？

一直打到底的抗联官兵，辽沈战役后许多人随四野进关、南下，大都身居大城市，从哈尔滨到广州，

## &lt;&lt;一将难求&gt;&gt;

许多城市都有，这又得多少时间？

还有写作、修改，100多万字的东西，也得两年左右呀！

有出版社愿预支稿酬，也有公司赞助，可一听得这么多年，待到那时，人家干什么还说不定呢。

从1989年到2005年，16年间，除采访别的题材“搂草打兔子”外，采访抗联多为自费。

到乡下采访，为了省钱，大冬天在县城租辆摩的，冻得鼻涕拉耷的。

非典时期搬家，妻子划拉一堆各种票据，仅住宿和车票两项就5万多元，且不说还丢了多少。

而我10年前每年的工资才多少？

还得养活老婆孩子呢？

抗联人本来就少，幸存者更少，像曹曙焰老人这样高寿、又能接受采访的，还要加个更字。

我与曹老同居一座城市，换一次公交车就到了，省钱又省时。

老人古语讲“丑妻近地家中宝”，而曹老当年是金子般的抗联战士，今天是金子般的采访对象，怎能轻易放过、不把他“榨干”呢？

其实，所谓“榨干”，也就是说说而已。

一个人几年、十几年的战斗经历，在那不行军打仗的日子像节假日一样少的岁月里，就算每天都有日记，能无遗漏？

把他榨干，怎么可能呀？

身为军人，常奉命写作。

写个中短篇，杂志几月号等米下锅呢，长篇出版社也有时间要求的。

编辑打电话问采访完了吗，我说完了，其实什么叫“采访完了”呀？

我非常尊崇穷尽一生干好一项事业的人，有些事是绝对值得大投入的。

报告文学作品的质量，与采访上投入的大小多少，绝对是成正比的。

像东北抗联、东北解放战争、四野进关、南下这样的题材，方方面面的投入倘能再大些，那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，可这些条件是很难得的。

5. 主人公已经去世了 1996年夏，有人约我为原人大副委员长、兰州军区、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将军写部传记，我说让我考虑一下，没敢立即应允。

一个活接不接，有很多因素，首先是能不能写好，有几成把握。

我喜欢在历史的硝烟中走笔，对韩先楚将军很是敬仰，对他率部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的历程也了解些，让我犹豫、忧虑的，是采访的难度太大了。

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，一个与你生活在不同时空的人，一个因其社会地位而让你觉得有种无形的沟壑、墙壁阻隔的人。

这些还在其次，关键在于这个人已经辞世了，已经不能与之沟通、交流了，而且没有留下《自述》之类的佐证。

就是一个鲜活的人坐在面前也难“榨干”，这样一个人怎么“榨”？

当然可以采访了解他的人，可那不就像没有黄豆榨豆饼吗？

当时，我正在赶写《西部神话》，主人公是新疆一位部队转业的企业家。

这年元旦乘机到乌鲁木齐，他说你有什么要求，我说别让我闲着就行。

除他本人从头到尾一道来外，还找哪些人采访，制定个计划，每天谈到半夜左右，谈了42天。

同样30多万字，写韩先楚的这本《战将》，采访用了两年。

乘坐各种交通工具，天南地北到处跑，去找韩先楚将军的战友、部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，秘书、司机、警卫员等等，当然还有家人。

再去他的家乡，中国著名的“将军县”湖北红安，采访他的乡亲。

谁也不能代替主人公自己，可除此而外，还有别的途径吗？

无论怎样抓紧时间，也像蜗牛在爬。

还像瞎子摸象。

任何采访，开头都有个瞎子摸象的过程，只是不像寓言中的几个瞎子摸的那头活大象，而像摸一堆零乱的肢体。

因为你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，也就不知道能组装个什么东西，只能边摸边琢磨。

## &lt;&lt;一将难求&gt;&gt;

这是个脑袋，这是脖子，这还有条大腿，又摸到一只象牙，噢，原来是头大象呀。

如果摸到的是其他有特征的标识性东西，比如像树杈样的角，或是两只毛茸茸的大耳朵，那就是鹿，或是兔子。

如果判断有误，本来是梅花鹿，却当成狼了，那就彻底毁了。

回顾“阶级斗争”年代，为了“紧跟时代潮流”，有时硬把先进人物往“纲”上“线”上拉，像把食草动物写成食肉动物，把人糟蹋了。

判断正确，组装无误，还需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，人物才能生动鲜活起来。

如果把故事、情节，包括细节，比作一部作品的硬件的话，那么最难搞懂搞准的就是软件，即人物的心灵世界。

这是一种字里行间的东西，无形，又无处不在。

而对于一个已经不能与之交流、沟通的人，一定要找到曾经最亲近的、甚至可以与他无话不谈的人，并尽力将其“榨干”。

其实，就是主人公在你面前，也要仔细分辨他说的话，哪些是那种特定年代通用的套话，哪些是用今天的意识替代了当年的思维、观念，哪些确实属于他个人的、个性的。

对于已经离世的主人公，这无疑更难。

但你必须竭尽全力地逼近他，才能比较准确地将其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终于走进了、逼近了，那感觉就像在漫长的隧洞中看到了前方的光亮，会立刻激动、亢奋起来，整个身心都沉浸于一种快感之中。

有时又想扭头就跑。

6. 陌生的题材 1986年，解放军出版社让我写部关于辽沈战役的长篇(即后来的《雪白血红》)，我蒙了。

一是之前从未写过长篇，就像赶辆毛驴车，一下子让开大解放，能驾驭得了吗？

二是和平年代的军人，不了解战争，除在报刊、小说、电影上了解点外，有关积累近乎零。

待到接受任务了，想“怀孕”，又不知“洞房”在哪里。

过去采访，就是一个人，一个单位，径直去了。

这回过去40来年了，当年的亲历者天南地北哪都有，出门都不知找谁去、往哪走。

1992年夏，正是中国房地产热时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邀我为建设部写部关于中国房地产业的长篇。

我知道这种题材对我有多难。

我的原则是，对于完全陌生的题材，轻易不要碰。

但由于某种不便道白的原因，我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。

结果，不光是瞎子摸象，还成了鸭子听雷。

我是炮兵出身，对步兵、装甲兵、通信兵、防化兵、工兵等等，都不大熟悉，更不用说还有空军、海军、第二炮兵了。

可对于有20多年军龄的军人，军旅中自有许多融会贯通之处。

就像采访《雪白血红》，无论什么样的时空阻隔，毕竟也是军人与军人对话。

而这次，接受任务前，我甚至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个建设部。

采访伊始，赶上全国房地产业会议，在会前记者招待会上，问答者口中不时出现“楼花”两个字，我怎么也搞不懂这是两个什么字，旁边一位新华社记者给我写下了。

“楼”与“花”，楼还有花？

这两个字怎么还能连在一起呀？

我望着他大惑不解，就觉得他跟我一样是个二百五。

真蒙啊。

中学时代，即得知“文学是人学”，报告文学也是写人的。

可对他(们)从事的职业、行当，总得明白个六七八呀？

半年多跑了6个省市自治区，采访几十位房地产企业家和官员，采访笔记40多万字，后来写出副题为“中国房地产业纪实”的《解放》，不到20万字。

一路买、收集有关资料，拿不动，一批批往家寄。

## &lt;&lt;一将难求&gt;&gt;

从来都是写什么就收集什么资料，妻子、孩子上街见了也买，20多年了。

还要采访有关专家。

这在许多时候是必不可少的。

第一次这么干，是采访《雪白血红》，快结束了，有些问题不大懂，特别是些敏感问题拿不准，就去了军事科学院。

这回请教的是建设部和清华大学的专家。

在他们帮助下，赖在脑子里的那些个“蒙”字，好歹算请走了些。

采访《大寨在人间》时，就想给此前的大寨画上个句号。

采访描写苏宁的长篇《血情》时，给自己定下个目标，写什么就要成为研究什么的专家。

我的体会是，采访完了，有点专家的感觉了，这个东西就有点希望了。

采写《解放》，始终没有这种感觉。

四野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，天候地理，对手同为国民党军，其主将(杜聿明、陈诚、卫立煌、傅作义、白崇禧、薛岳)的性格、用兵特点，都不断变化，就有个不断熟悉的过程。

至于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，新中国成立后又跨过鸭绿江，与以美国为首的“联合国军”对阵，那变化就更大了。

作家也一样，写完这个写那个，要不断地变换战场。

现在让我再写四野和东北抗联的东西，就比较容易，处理其他战争，或东北地区的题材，进入也会较快。

如果是像房地产业这样的题材，冷丁闯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，一切从头学起，那就难了，而且可能费力不讨好。

就像一支没有重火器的部队攻坚，伤亡大，又难成功。

在田径场上比拼速度的项目中，人们把金牌连同鲜花、掌声，献给那个跑得最快的人。

其实，落在最后边的那个人并未偷懒，有的甚至是最累的。

7. 听听不同的声音 去大寨采访，开头没人理睬，许多人甚至躲着我。

这是我第一次被人拒绝采访。

如今，记者、作家被拒绝采访，甚至被打，已不算新鲜事了。

上世纪80年代前，没听说这事。

那时出现在书报和各类媒体上的，几乎都是正面的好人好事。

说他好还不高兴吗？

孙子表扬爷爷，爷爷也高兴的。

而大寨人不理睬我，则是因为我到那里时，“批大寨”高潮刚过，以为我又是去“批大寨”的。

那个年代找不到哪一群农民像大寨人那样，见过那样大的世面，又那样大起大落了，他们受的伤害也最大。

这当然不仅是因为“批大寨”，就是在“学大寨”热潮中被捧上天去时，绝大多数大寨人又怎么的了？

不也照样是土里刨食的农民吗？

“阶级斗争”年代，一些“罪该万死”的人，不也就是下放到农村当农民吗？

那之后，在我经历的被拒绝采访中，有的人会说你要采访的那个人已经死了，你要让他活了，我就没法活了。

有人这样说着，会情不自禁地讲起来，讲着讲着，猛然醒悟，戛然而止。

大寨人不属这种。

他们不理睬我，除了误解外，还有太多的东西要倾述，一旦爆发就不可扼止了。

我曾觉得我去的不是时候，其实正是时候。

如果不是在那种历史的起落点上，而是在“学大寨”热潮中，听到的不也只能是几近千篇一律的东西吗？

10多年后，我到处跑着采访一部长篇，采访工程近一半时，去见邀请我写作的那个人。

他问我都采访了些什么人，我一一道来，被他打断了：你采访他们干什么？

## &lt;&lt;一将难求&gt;&gt;

还想写吗？

这两个人有问题，有问题！

我说：写不写，怎么写，还不好说。

人难免有缺点毛病，我想听听各个方面的意见。

写个中短篇，容量有限。

一部全景式长篇，就需要全方位展示了。

还说东北抗联、东北解放战争和四野进关、南下这样的题材，战略决策、战役指挥有何失误，失利的战斗，意见分歧，“路线斗争”，有的是不是能写？

有些时候，有些东西是不能写的，有的叫你写也不能写。

生活中有些东西是难以逾越的，有时愈是命运攸关的东西愈得回避，起码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如此。

古今中外‘难免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省事了，而是仍要采访，有时甚至更要扎实、深入。

因为有些东西不能写，也得心里有数才行。

像传记类通常要写写传主的爱情，你只听他和一些人讲，如果他也有另一面的东西，而你木匠斧子一面砍，有知晓内情的人，会骂你捧臭脚。

你左顾右盼，心里有数了，再听到“夫妻恩爱”、“家庭和睦”什么的，写不写，怎么写，下笔就有分寸、底线，不至于写满了。

听听不同的声音，可使作品客观、公允，经得起历史检验。

采访《解放》时，深圳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已经采访过了，印象挺好，想起件事还要问问，给市国土局打电话。

负责安排我采访的那个同志说，我正想找你呢，这个人出事了，你别写他了。

《解放》写了一半，山东省建委的同志来信，告诉我在济南采访的一位副区长兼房地产公司老总不能写了，腐败了。

2003年夏，我在报纸上看到11年前采访的深圳市长助理、后来事发时为副市长的王炬，被判刑了，也腐败了。

感慨之余，找到《解放》，把写王炬的几页看了看，感觉是被搨了一记耳光。

有时受邀写作，谈条件时就说：我希望能够听听不同的声音。

有些时候，这是不易做到的，有些责任也不是作家能负得起的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应尽力，可以不负责任。

8.采访工程过半，作品就要成型了 开头采访听不懂，逐渐明白些了，听进去了，素材在脑子里活起来，就像孕妇感到胎动。

采访工程近半，或过半，作品就该成形了，明确自己要写的是个什么东西了。

如果这时仍然心中无数，就意味着接下来的采访仍是被动的，盲人骑瞎马般不知所终，而任何采访都不可能是无限期的。

待到回家坐在书桌前，再把主题、构思琢磨出来，会发现采访到的东西，能够用得上的不多，用不着的倒弄了一堆。

主题、构思出来了，听采访对象谈着，就知道这件事应该放在哪章哪节了。

这时仍不能自己觉得缺什么就问什么，直奔主题，仍要放开谈，多找些人谈。

因为生活太丰富多彩了，在素材占有上，越贪婪越好。

打个比方，木匠打个衣柜，需要12根方子，你有24根、48根、96根，可随意选择，挑最好的，打出那衣柜自然美观、耐用。

采访中，思想的轮子一刻不能停歇，始终处于一种紧张、兴奋状态，一种酝酿、孕育的过程。

人不是录音机，只管把声音记录下来就行了，耳听手记，眼睛也不能闲着。

忙里抽闲，把采访对象的肖像画下来，有特点的部位是什么，习惯动作是什么，激动起来什么样子。

客厅墙上一幅条幅，或是别的什么物件，可能引出一个故事。

回到住处吃完饭，再翻看采访笔记，想想明天的话题，来回路上也得琢磨。

而最根本的是，我到底要写个什么东西呀？

## &lt;&lt;一将难求&gt;&gt;

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呀？

摸到了“大象”的“象牙”没有呀？

作品未成形前是最紧张、焦灼的。

终于摸到了，悟出来了，应该轻松些了吧？

不行，还得不断地否定、逼问自己：你真的逼近了事物的本质的真实了，就是你确认的这一个吗？

万一偏了、歪了，甚至错了呢？

谁也不能没有情感、偏见。

而同一件事，被搞得面目皆非，或者截然相反，我们这代人是见识过的。

我是把每部作品都当成自己的孩子的。

我的感觉是采访工程结束了，就仿佛听到婴儿的啼叫了。

9.“四快一慢”自1987年以来，我的采访大都是在干休所进行的。

什么时间钓鱼、练书法、打门球、打麻将，身上少有不带伤疤的离休老人，生活挺有规律，有的雷打不动。

80岁左右的老人，谈话也累，特别是跟我谈话。

回忆战争年代，容易激动，血压升高，失眠。

所以，每个老人只谈半天，不能连续作战。

到一座城市采访，手头有10个采访对象，彼此串开，才能大体保证上午、下午、晚上都有活干。

每天采访3个人，提前排定时间，头天晚上再打电话确定一下。

还要有“预备队”，物色一位身体好，又爱谈，且随时可谈的老人，不然有人临时变化，那半天就放空了。

采访、写作，没有8小时工作制，也没有双休日、节假日。

作家这个职业，完全是个体劳动，不干活就是罢自己的工。

我爱看赵本山的小品，每年春晚该他出场了，妻子就喊开始了、开始了。

她有提前量，我得把一句话，或一个自然段写完哪？

结果难得有看到头的时候。

2002年7月的一天，有个问题还要请教曹曙焰老人，打电话预约时间。

接电话的是曹老的夫人，说他“走了”。

几个月前还谈过，挺健朗的，一时间竟没明白“走了”的意思，还问“去哪了”。

同年底，为写《枪杆子：1949》，去广州采访20多位老人，记忆、谈吐都好。

不久前，广东电视台为庆祝建国60周年搞台节目，再找这些老人，还能接受采访的只有两位了。

老红军(包括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前的抗联)90岁以上，老八路80岁以上，参加解放战争的不应低于75岁——想想自然法则？

抢救历史！

我永远忘不了最先率团冲进广州的两位团长。

都是山东人，老八路，一位很健壮，另一位就差多了，肌肉松弛，嘴唇兜不住口水，谈话时口水顺嘴角流。

最后一次采访，老将军拄着拐杖，颤巍巍送到大门口道：小张，你回去快点写呀，不然我看不到了。

而天南地北采访抗联，有的抱病跟你谈呀谈呀。

最早采访的，距今已整整20年了。

有人可能早就想了，这人怎么光采访，不写东西呀？

广州那位让我快点写的老将军，本来应该看到那本书的，因为我一点也没耽搁，很快就写完了。

而关于抗联的这本《热雪》，如果不差钱，一口气儿采访几年，也早写完了。

林彪的“六个战术原则”中，有个“四快一慢”(即“向敌前进要快”，“抓住敌人后进行准备要快”，“突破后扩张战果要快”，敌人溃退了“追击时要快”，“一慢”是“总攻发起时机这一下要慢”，“上级催骂，派通信员左催右催，这就要沉着，反正我要准备好再打。

)，我觉得用在采访上也行。

一是进入情况要快，赶快“怀孕”。

## &lt;&lt;一将难求&gt;&gt;

二是腿脚要快，你得到处跑呀。

三是记录要快，慢了不行。

除重要、敏感、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外，一般我都不录音，就是笔记。

不然，采访省事了，回家后还得用相同的时间听录音，谁受得了呀？

四是构思要快，尽快明确写个什么东西，搭好架子。

当然还可以有五快、六快、七快。

一慢，就是在采访上一定要舍得花时间，采访时节奏快，把时间填满，不能慢慢来，把时间放跑了。

但在宏观上，一定不能着急，草草收兵。

写作报告文学最不能吝啬的，就是花在采访上的时间和气力。

记者下午采访，明天就得见报，新闻嘛。

报告文学，特别是历史题材，几十年前的事，你急什么？

关键在于掌握素材，看谁走进历史更深，距本质真实最近。

写作报告文学，需要责任感，需要激情，也需要一种平常心。

特别是历史题材，由于历史的原因，今天只要采访到位，在某种意义上，能够比较原汁原味地描述下来，甚至不需要刻意地去做什么，即是创作，即能出新了。

1966年高中毕业，然后是红卫兵、下乡知青、参军，再无求学机会。

80年代中期兴起自修、函授热，大专、本科、研究生什么的，给同事写了些考试作文，自己却无动于衷。

在报告文学创作队伍中，我绝对是个土生土长的土八路，理论根底很浅，以上谈的尽管是些关于采访的ABC，也难免谬误。

能够断言不谬的是，报告文学作品的质量，是绝对与采访中下的气力成正比的。

10. 关于这本书 一、四野战将如云，本书写了13位名将，在第十四章《群像》里还简要写了4位。当然不止这些。

自1987年采访《雪白血红》后，一些将军虽未谋面，也逐渐熟悉些，生动鲜活起来。

有的由于各种原因，采访、收集素材、资料较少，难以成章，有机会当会继续采访，再写。

二、本书所写名将，不是“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”，而皆在于占有素材、资料的多少。

即便篇幅最长的，最能表现其名将风采的情节、细节，有些很精彩的东西，可能也被历史湮没，无从知晓了。

三、前面说过，笔者曾为韩先楚将军写过一部长篇《战将》。

他是当之无愧的四野名将，本书少不了的。

这是需要说明的，并向买了看了《战将》的读者致歉。

2009年3月27日 大连

<<一将难求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兵民是胜利之本。

——《论持久战》，《毛泽东选集》第2版第2卷第509页 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，辽西战役的时候，正是秋天，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，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。

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。

在这个问题上，战士们自觉地认为：不吃是很高尚的，而吃了是很卑鄙的，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。

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。

——《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》，《毛泽东文集》第7卷第162页 有人说，武器是第一，人是第二。

我们反过来说，人是第一，武器是第二。

武器同机器差不多，都是人手的延长而已。

是人拿在武器手里，还是武器拿在人手里？

当然是后者，因为武器没有手，哪个武器有手？

我打了二十五年仗，包括朝鲜战争三年。

我原来是不会打仗的，不知道怎样打，是通过二十五年的战争过程学会打的。

我从没有看见过武器有手，只看见人有手，而人用手掌握武器。

——《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》，《毛泽东文集》第8卷第386页

<<一将难求>>

编辑推荐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